

冯雪峰

文艺思想

蔡清富
文津出版社

论稿



(京) 新登字205号

冯雪峰文艺思想论稿
FENG XUEFENG WENYI
LUN GAO
蔡清富 著

文 出版社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5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54-112-4/I·40
定价: 3.50元

序

敏 泽

雪峰同志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一位久经沙场的革命战士，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之一。本世纪的20年代初期，他是一名“湖畔”诗人，从此步入文坛。20年代中期起，雪峰精力集中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方面，短短的几年间，翻译了12种这方面的著作（单篇文章不计在内）。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从理论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准备。

1928年，雪峰结识了鲁迅，从此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鲁迅忠实的学生和战友，鲁迅思想、鲁迅方向的坚定而热情的宣传者和捍卫者。

在以后的岁月中，雪峰同志虽然有时也写点文学作品，但主要精力却放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直到1957年前，在各个重要的不同历史时期内，关于当时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争论，雪峰没有不积极参加，并留下了重要著作的。这些著作，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及理论批评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雪峰一生的文学理论活动，有着令人瞩目的一贯性和特色。雪峰的一生，首先是一个杰出的革命战士的一生。他一贯地坚持文艺的革命方向，却又始终反对将革命文艺等同于宣传品的做法；强调生活体验的重要性，又充分地重视作家

主观的激情、才能、艺术文化素养等等因素；重视艺术的革命功利思想，而又坚持反对文学上的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在“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提倡者中间，雪峰有着坚定而鲜明的革命性和原则性，又极少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左”倾幼稚病，这无疑是十分难能而可贵的。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雪峰受到了攻击和诬陷，蒙受了不白之冤。

雪峰的文艺思想，在基本精神上与鲁迅是完全相一致的，不愧为鲁迅思想的忠实宣传者、捍卫者和执行者。

今天，我们的时代虽然发展了，文学面临着崭新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任务，但如果我们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抱着求实的态度来审视这份遗产，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雪峰文艺思想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的价值。

除了在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外，雪峰还是一个人品高洁的人。他忠诚无私，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关心他人。和雪峰同志有过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不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做人的榜样，并汲取精神上的力量的。

蔡清富同志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搜集资料，精心结撰了这本《冯雪峰文艺思想论稿》，将雪峰的生平，及其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理论活动与见解，都忠实地做了叙述，资料翔实，条理清楚，叙述、评论力求平允。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部研究新文学史上重要理论家冯雪峰的专著，并且是一部具有较好水平的专著。我曾仔细地审阅过原稿，读完之后，我是感致欣喜的。

全国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我在雪峰领导下工作，1957年又因同一原因遭受厄运，直到雪峰逝世前，又断断续续地

保持着来往。雪峰对于我，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清富同志的稿件又是我鼓动他写出来的，因此在他要求我为本书写序言时，我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1988.10.15

于京寓偏远楼

目 录

序.....	敏 泽
冯雪峰传略.....	(1)
用“马克思主义X光线”去照澈文学	
——雪峰对评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11)
革命文学论争中初显理论家的风姿.....	(25)
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主张	(42)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看法.....	(59)
为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	
——雪峰与文学界的两个口号论争	(76)
对政治与艺术关系认识的嬗变.....	(88)
论典型艺术形象的创造.....	(105)
主观力与文艺创作.....	(118)
他化力 创造力 国际化	
——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认识	(131)
鲁迅研究的“通人”	(143)
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方法.....	(178)
李何林与冯雪峰——文艺思想的知音.....	(189)
谈《雪峰文集》未收的八篇文章.....	(206)
后 记.....	(214)

冯雪峰传略

冯雪峰（1903——1976年），浙江省义乌县人。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作家、鲁迅研究专家。原名福春，改名雪峰，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何丹仁、O. V.、吕克玉等。

冯雪峰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参加劳动。九岁入邻村私塾读书，一年后转入义乌县立小学学习，1918年小学毕业。次年考入金华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曾带领同学反对学校专制，被开除学籍，于1921年秋转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入校不久，即参加了由朱自清、叶圣陶指导的新文学团体晨光社（社员尚有柔石、潘漠华、魏全枝等），开始写作新诗。第二年春天，与潘漠华、汪静之、应休人结成湖畔诗社，出版诗集《湖畔》、《春的歌集》。他们被称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①的青年，诗风纯朴天真，清新明快。

1925年春，冯雪峰来到北京，他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旁听（曾多次听过鲁迅讲课），一方面自修日语。本年在应休人主编的《支那二月》上发表诗和散文。为了维持生活，他曾搞过校对、当过家庭教师、做过故宫博物院雇员等。从1926年到1927年，他在北京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

①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等，介绍和研究苏联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同志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1月，因在被抄查的一部译稿上写有“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而遭追捕，他只好离京南下。

1928年二、三月间，冯雪峰到了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7月至11月，任本县初级中学国文教员，常选鲁迅作品做为教材；此时担任中共城区支部书记，进行着地下工作。因遭通缉，返回上海。12月，通过柔石介绍结识了鲁迅。从1928年到1930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翻译出版了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如《新俄的文艺政策》、《作家论》（沃罗夫斯基著，后改名为《社会的作家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列汉诺夫）、《文学评论》（梅林）《艺术社会学的任务及问题》（弗里契）、《现代欧洲的艺术》（玛察）等。冯雪峰翻译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X光线”，“去照澈现存文学的一切”。上述著作的正确观点，对冯雪峰有积极的影响；其中的机械论，也对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之际，冯雪峰仗义执言，写出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他敢于指责创、太二社的宗派主义，维护鲁迅，就是因为受到了《新俄的文艺政策》一书好的影响；而把鲁迅派定为“同路人”，受的却是“当时苏联几个机械论者的理论的影响”^①。“左联”

① 《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第131页。

成立前后，冯雪峰在《萌芽月刊》上还以《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为题，选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拓荒者》上以《论新兴文学》为题，节译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是马克思、列宁的有关文艺论著较早在中国的译文，它们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冯雪峰的上述译介工作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他在鲁迅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翻译的《文艺政策》、《文艺与批评》等，得到冯雪峰的校勘、订正，鲁迅也“感谢雪峰君”的帮助。

1929年10月，冯雪峰受党组织委托，负责沟通鲁迅与党的关系，有效地促进了鲁迅等与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的联合。稍后，他与鲁迅、柔石、冯乃超、夏衍等，作为“基本构成员”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使“左联”在1930年3月2日得以顺利成立。从1930年到1933年，冯雪峰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他协助“左联”旗手鲁迅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如主编或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青年革命作家的罪行，撰写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等文；撰写《常识与阶级性》、《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批判“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错误文艺观点；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评介新人新作，为“左联”起草宣言、决议等。由他起草的、经“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茅盾认为，“这个决议可以

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〇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一段时期的活动。”①

1933年底，冯雪峰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段时间，他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二人谈论较多的是对鲁迅的看法。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任红九军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中央纵队干部团上千队政治教员、红军大学高级班政治教员。他在长征中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协助部队领导做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

1936年4月，由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党中央交给他四项任务：建立秘密电台；向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对文艺界的工作也附带管一管。冯雪峰到上海后向鲁迅、茅盾等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并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在文艺界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与鲁迅、胡风、茅盾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以“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②。当“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发生激烈争论，并严重影响

① 《“左联”时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到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时候，冯雪峰坚持原则，坚持以鲁迅为旗帜的团结，为病中的鲁迅代拟文章，他笔录了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并协助鲁迅撰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用以揭穿托派阴谋，表示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拥护，说明两个口号的正确关系。经过冯雪峰的努力，促成了由各方面代表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这表明两个口号论争的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在两个口号论争末期，冯雪峰以吕克玉笔名发表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对当时文艺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对“文学理论上的机械的观点”的批判，更抓住了革命文学论争以来在文艺界长期存在的致命弱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十月间，鲁迅病逝，冯雪峰参加主持丧事，他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商定治丧委员会名单时，写上了毛泽东的光辉名字。经过多方努力，冯雪峰还在一个和我党有关系的人士的家里，找到了毛泽东失落的两个孩子——岸英和岸青，托人带往国外学习深造。冯雪峰还向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详细介绍了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情况，史沫特莱据此写出了报导，发向世界，使各国人民第一次了解到我国红军长征的壮举。美国另一著名记者爱德加·斯诺，也通过冯雪峰的联系，辗转到陕北，后写出了震动中外的名著《西行漫记》。

1936年8月，冯雪峰任上海中共办事处副主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他作了题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报告（收集时更题为《鲁迅论》），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战斗

精神做出了高度评价。“七·七”事变爆发后，因对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不满，曾与博古发生激烈争论，年底离职回乡。1939年下半年，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故乡三年多的时间里，冯雪峰一方面积极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创作反映长征生活的长篇小说，并撰写了《关于“艺术大众化”》、《论典型的创造》、《论形象》、《文艺与政论》、《民族性与民族形式》、《过渡性与独创性》等论文。这时的文章突破了他“左联”时期着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格局，而从美学与社会学统一的角度，侧重探研文艺的特质，如形象与典型、内容与形式、继承与独创等问题，这表明他的文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冯雪峰在1940年11月写出了反映长征生活小说的初稿，约50万字，书名由《红进记》改为《卢代之死》。但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皖南事变中，书稿失落，实为憾事。

1941年2月，冯雪峰在故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江西上饶集中营。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不仅经受了苦役和疾病的折磨，还组织难友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狱中创作的诗集《真实之歌》，感情浓烈、意境深远，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比其20年代的诗作在思想、艺术上都更加成熟。冯雪峰入狱一年之后，其被囚消息才为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陈云等所知，他们立即电请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设法营救。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由宦乡、郭静唐出面交涉，才于1942年11月以治病为名保出。

冯雪峰从狱中出来后，先在浙江丽水、小顺暂住四个多月，一方面养病，一方面为《东南日报（丽水版）·笔垒》审稿、撰文。后来到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工作和文学活

动，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教育下，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文艺论著《过来的时代》（1946年，上海新知识书店）、《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1947年，上海作家书屋）、《雪峰文集》（1948年，上海春明书店）等，在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根本问题，对文艺与生活、政治与艺术、客观与主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与人民、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精辟见解。冯雪峰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达到了当时国统区文艺理论的最高水平。

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创作的杂文集有《乡风与市风》（1944年，重庆作家书屋）、《有进无退》（1947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跨的日子》（1946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以及解放后出版的《论文集》中的部分篇章。他的杂文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对当时社会畸形的思想与伦理，往往深掘其历史渊源和蔓生的时代土壤，以绵密的说理，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挹伐，在多少有些晦涩的文字中间，显示出逻辑的力量、哲理的光辉和可感的形象。冯雪峰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寓言有《今寓言》（1947年，上海作家书屋）、《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1949年，上海作家书屋）。这些寓言既犀利、深刻，又有诗的意境与形象，起到了埋葬旧社会、迎接新中国的作用。冯雪峰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开拓者。他还编述印度《百喻经》中寓言98则，以《百喻经故事》刊行问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在上海工作，1951年调至北京。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协会主

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新地》月刊主编、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解放后，他出版和发表的文学论著有：《论文集》、《论〈保卫延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回忆鲁迅》、《论〈野草〉》、《鲁迅的文学道路》、《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等，还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出版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当代青年作家的作品，负责编印了《瞿秋白文集》、《可爱的中国》（方志敏）、《应修人潘漠华选集》等，而他最突出的贡献则是负责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工作。1951年影印的24本《鲁迅日记》（1959年又排印出版），1956年至1958年出版的带注的10卷本《鲁迅全集》，以及大约同时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同全集本），1958年出版的10卷《鲁迅译文集》，都渗透着冯雪峰的大量汗水和心血。冯雪峰不愧是鲁迅遗产的“通人”（许广平语）。

从50年代中期起，冯雪峰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而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1955年，因“胡风事件”而在党内受批判，作检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接着被开除出党。这对对党有深厚感情的冯雪峰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情。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他想重写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当他把建国初期写出

的部分稿本从箱底取出，正准备下笔之际，却被告知：他不适宜写长征题材。在悲愤之下，他将书稿付之一炬。冯雪峰曾用十几年时间搜集和研究“太平天国”史料，准备写一部《小天堂》的长篇历史小说。但只写了部分章节，便在1965年秋天被派赴河南安阳参加“四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召回北京，关进“牛棚”。这期间，他应外调要求写了许多回忆材料，如《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关于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务以及我同文委和“临委”的关系》等。在写这些材料时，他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不挟嫌捏造，不落井下石，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

1969年9月至1972年10月，冯雪峰到湖北省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当时“四人帮”叫嚷要挖“30年代的出版黑线”，矛头指向三联书店（特别是生活书店和邹韬奋同志），企图以此反对周恩来同志。冯雪峰不顾自己身处逆境，挺身驳斥“四人帮”对生活书店的攻击，勇敢捍卫30年代左翼文化出版战线的战绩。冯雪峰对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无比愤恨。他借用古语指责林彪：“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多次移用鲁迅的话痛斥“四人帮”，说“三点水”（指江青）是个“惯行佞妇之道的嬖幸”；王洪文是“上海滩上的浮尸”；姚文元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认为这伙人民愤极大，没有枪杆子支持，笔杆子也很拙劣，日子长不了。

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他除写作《小天堂》外，把主要精力放在鲁迅著作的整理和研究上。他为鲁编室看稿、答疑。为有关单位提供材料，还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

记》，并打算写一部较为完善的关于鲁迅的论著。他热情地接待来访青年，对后一辈的鲁迅研究者予以帮助。在大病缠身的情况下，仍为培养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倾注着心血。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同志不幸逝世。1979年4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党中央为他的“右派”问题作出改正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同年11月17日，为冯雪峰同志举行了追悼大会。悼词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诗人”，“在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方面，冯雪峰同志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悼词说：“冯雪峰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忘我。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许多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冯雪峰论文集》上、中、下三卷，收录了作者1926年至1958年所写的文艺论文、政论、杂感、序记近200篇；该出版社1981至1985年出版的《雪峰文集》四卷本，辑录了作者1921年至1975年的几乎全部著作。冯雪峰的论著，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用“马克斯主义X光线”去照澈文学*

——雪峰对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二十年代前期，冯雪峰是“湖畔诗社”的著名诗人；而到了三十年代，他则成了驰骋文坛的理论家、批评家。冯雪峰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促进，另一方面是他自身的兴趣爱好有所转移。我认为，从二十年代下半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冯雪峰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是他从诗人到理论家的过渡时期。

让新俄文学的曙光照进中国

1925年的“五卅”运动犹如一声春雷，冲破了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而造成的文坛沉闷局面，许多作家投入实际的革命工作，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迁。茅盾、郭沫若、鲁迅等，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革命与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等，宣传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这可以说是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先声。包括冯雪峰在内的“湖畔”诸诗人，“也因为‘五卅’运动的震动，各人的思想情绪都起了变化，逐

-
- 在冯雪峰的早期文章中，有时把“马克思”写成“马克斯”。笔者照录原文。